

东北、内蒙古出土的耀州窑青瓷^{*}

——以墓葬材料为中心

彭善国 刘辉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关键词: 耀州窑, 青瓷, 东北, 内蒙古, 流布

摘要: 东北、内蒙古地区耀州窑青瓷的出土,集中于辽、金两个时期。出土耀州青瓷的辽墓,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且时代绝大多数在1020年代之前。这些青瓷类型有碗、盘、注壶、盏托等,与五代宋初耀州窑址青瓷产品造型、釉色、装烧特征相契合。这些青瓷或是通过五代对契丹的贡奉或贸易流入辽境的。与辽代比较,东北、内蒙古金代耀州青瓷发现的数量虽然少了很多。但是从流布的地域上,则比辽代有所扩大,这反映了金代各窑场产品竞争与流通格局的变化。

KEY WORDS: Yaozhou kiln, Celadon wares, Northeast China, Inner Mongolia, Distribution

ABSTRACT: The excavated celadon wares of the Yaozhou kiln in northeast China and Inner Mongolia date primarily to the Liao and Jin dynasties. Liao tombs that were buried with celadon wares were primarily distributed in the southeastern part of Inner Mongolia and western part of Liaoning, with the majority of them predating 1020 A.D. The types of these celadon wares include bowl, plate, ewer, cup stand, etc. Their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shapes, glaze color, and the ways they were loaded in kilns show that they were products from the Yaozhou kiln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and Early Song dynasty. These celadon wares might have been tributes from the Five dynasties to the Liao Empire or trading commodities between these empires. In comparison with the discoveries of Liao wares, the numbers of Yaozhou wares in northeast China and Inner Mongolia dropped significantly during the Jin period, but their distribution area significantly enlarged instead. These indicate the change of distributional patterns and competition between different kilns during the Jin Dynasty.

陕西铜川黄堡·耀州窑(以下简称耀州窑)的发掘(1958~1959年)标志着中国陶瓷考古由窑址调查为主的阶段转向科学发掘的阶段,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半个多世纪以来,耀州窑遗址经过多次发掘,继1965年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窑址报告《陕西铜川耀州窑》之后^[1],又相继刊行了《唐代黄堡窑址》^[2]、《五代黄堡窑址》^[3]、《宋代耀州窑址》^[4]、《立地坡、上店耀州窑址》^[5]等4部田野考古报告,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耀州窑生产沿革、产品类型及生产工艺等的认识。发掘表明,约10世纪以来,耀州窑始以青瓷产品独擅胜场,渐次发展起来的剔刻花、印花装饰技法代表了黄堡·耀州窑青瓷(以下简称耀州青瓷)的风格,也构成了所谓耀州窑系青瓷的特点。

古代窑场是瓷器的生产地,故窑址发掘是瓷

器窑口判别、制烧工艺复原的基础。各地城市、村落、墓葬、窖藏、佛塔等出土的瓷器,说明了各窑产品使用和流布的情况。内河、近海及远洋发现的若干沉船,则揭示了瓷器的运销形式及流通的路线。耀州青瓷影响广泛,各地出土数量众多。如果将这些考古资料加以全面搜集、系统分析,相信会促进耀州青瓷的编年及分期、流通及使用等方面的研究。这也是撰写本稿的缘起。为突出重点,且篇幅所限,本稿以东北、内蒙古地区出土资料为主^[6]。

为研究的方便,兹将东北、内蒙古出土的耀州青瓷器列为表一。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批准号:12JJD780004)、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

表一 东北、内蒙古出土耀州青瓷器

序号	地点	单位	年代	出土器物/数量	出处
1	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罕苏木苏木	耶律羽之墓	942 年	碗 2	[7]
2	内蒙古巴林左旗白音罕山	韩匡嗣夫妇合葬墓	983/993 年	穿带瓶 1 盒盖 1	[8]
3	内蒙古奈曼旗青龙山	陈国公主墓	1018 年	碗 8	[9]
4	辽宁朝阳姑营子	耿延毅墓	1020 年	碗 6	[10]
5	辽宁阜新	萧德温墓	1075 年	碗 1	[11]
6	辽宁法库	叶茂台 M7	推测为 970~977 年	罐 2 碗 10	[12]
7	辽宁法库	叶茂台 M14		碗 1 盘 2 盖托及盖各 1 , 注壶 1	[13]
8	辽宁法库	叶茂台 M22		盖托及盖各 1 碗 9	[14]
9	辽宁法库	李贝堡墓		碗 1	[15]
10	辽宁彰武	高成村墓		碗 12 盘 2 注壶 1	[16]
11	辽宁彰武	朝阳沟 M3		碗 1	[17]
12	辽宁彰武	朝阳沟 M2		碗口沿	[18]
13	辽宁彰武	东平村墓		盘 1	[19]
14	辽宁阜新	七家子墓		盖 1	[20]
15	辽宁阜新	关山 M7	推测为 970~980 年	罐 2 盘 12	[21]
16	辽宁阜新	梯子庙 M2		碗 1	[22]
17	辽宁阜新	大固本墓		盖托及盖各 1	[23]
18	辽宁义县	清河门 M4		盖托 1 碗 1	[24]
19	辽宁朝阳	纺织厂墓		注壶 1	[25]
20	辽宁朝阳	前窗户墓		盒 1	[26]
21	辽宁康平	后刘东屯 M2		盘 8	[27]
22	辽宁北票	水泉 M1		摩竭形水盂 1	[28]
23	辽宁锦州	张扛村 M3		盖 1	[29]
24	辽宁凌源	二道沟		注壶 1	[30]
25	辽宁凌源	二道沟		盖 1	[31]
26	内蒙古巴林右旗	床金沟 M5	不晚于 1012 年	注壶 2 盖托 2	[32]
27	内蒙古扎鲁特旗	浩特花 M1		碗 1	[33]
28	内蒙古科右前旗	白辛屯墓		盖 2	[34]
29	内蒙古通辽	二林场墓		碗 3	[35]
30	内蒙古敖汉旗	英凤沟 M7		碗 1	[36]
31	黑龙江绥滨	中兴 M7	金代	碗 1	[37]
32	黑龙江绥滨	中兴 M3	金代	罐 1	[38]
33	辽宁西丰	凉泉窖藏	金代	碗 1 盘 1	[39]
34	辽宁朝阳	营州路遗址	金代	碗 2 盘 1	[40]
35	辽宁抚顺	抚顺城址	金代	印花碗 1	[41]
36	吉林前郭	塔虎城城址	金代	碗 3	[42]
37	吉林白城洮北区	城四家子城址	金代	碗残片	[43]
38	内蒙古林西县	温都窖藏	金代	香炉 1	[44]
39	内蒙古清水河县	下城湾古城	金代	盘 3	[45]
40	内蒙古和林格尔县	什进窑子遗址	金代	香炉 1	[46]
41	内蒙古和林格尔县	樊家窑乡	金代	碗 1	[47]
42	内蒙古察右前旗	集宁路古城址	金代	碗多件	[48]



1

2



3



4

图一

1. 巴林右旗床金沟 M5 注壶 2. 朝阳纺织厂墓注壶
3. 彰武高成村墓注壶 4. 凌源二道沟注壶



1



2

图二

1. 叶茂台 M14 盏托及杯 2. 凌源二道沟盏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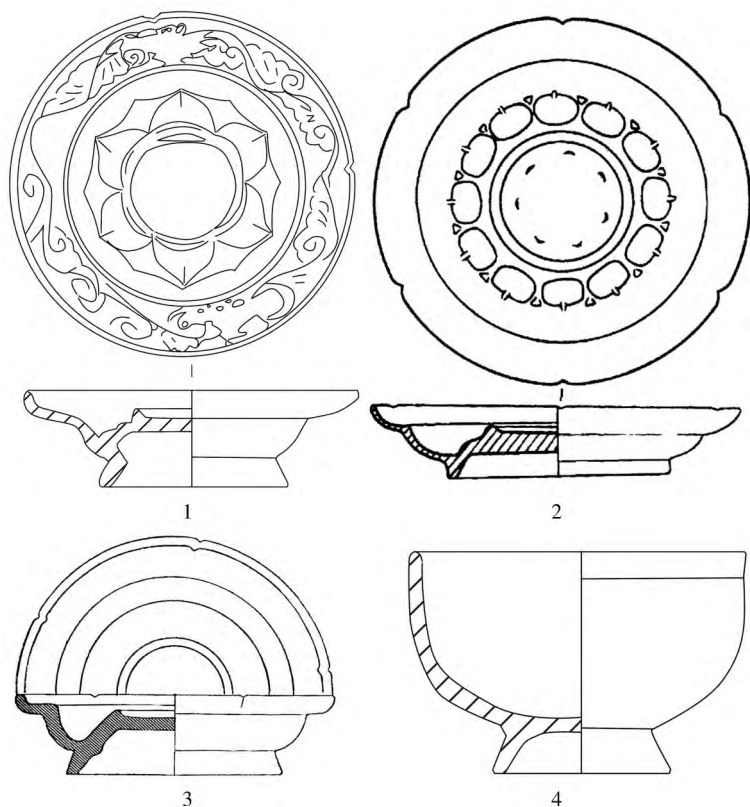
表一 1~30,绝大多数为辽代墓葬(凌源二道沟出土者单位不明,从器物的完整程度来看,应该是出自墓葬,且注壶及盏似应属同一组合)。这些墓葬位于内蒙古东南部(科右前旗、通辽市、扎鲁特旗、奈曼旗、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巴林左旗、巴林右旗、敖汉旗)和辽宁西部(康平、法库、彰武、阜新、义县、北票、朝阳、凌源、锦州),即辽国腹心之地,同时也是契丹贵族及汉族官僚墓葬集中分布的地区。以上单位出土耀州青瓷共计 110 件。

根据既有辽墓、辽瓷的编年成果^[49],上述墓葬中晚于公元 1020 年者仅阜新萧德温墓一例。该墓出土的耀州青瓷碗,胎粗厚,灰白色,釉青灰色,碗内印缠枝花纹,外为刀划纵条纹。与之纹饰极近的标本还见于天津蓟县独乐寺辽塔(1058 年)^[50]、河北张北辽墓^[51],也是耀州窑北宋中期碗、盘的典型装饰^[52]。其余墓葬,年代均在 942 年(耶律羽之墓)和 1020 年(耿延毅墓)之间。以下重点分析这些墓葬中出土的耀州青瓷。

这些墓葬出土的耀州青瓷,常见的为注壶(5 件)、盏托(6 件)、盏(8 件)、碗(68 件)、盘(25 件)、罐(与盖子配套 4 件)。分述如下。

注壶,共同的特征为:长颈,折肩,曲柄,球腹,宽圈足外撇。造型及装饰的差异见表二。

盏托,见于叶茂台 M14(图二, 1)、叶茂台 M22(图三, 1)、清河门 M4(图三 3)、床金沟 M5(图三 2)以及大固本等辽墓。形制相同:六出花口,折沿曲腹,圈足宽高,托面低于盘口。有的盏托内壁还刻划花纹。



图三

1. 叶茂台 M22 盏托 2. 床金沟 M5 盏托 3. 清河门 M4 盏托 4. 叶茂台 M22 盏

盏, 多与盏托配套使用, 见于叶茂台 M22(图三, 4)、叶茂台 M14、大固本墓、白辛屯墓以及二道沟(图二 2)。口径均在 9 厘米以下, 圈足较高且外撇, 圆口或花式口, 个别带把手。

碗, 口径在 12 厘米以上, 可分为圆口碗和花口碗两种。

圆口碗, 分为两型。

A 型 腹壁斜直。可以分为两个亚型。

Aa 型 敞口, 见于耶律羽之墓(图五 1)、陈

国公主墓(图五 3)、耿延毅墓、高成村墓、英凤沟 M7(图五 4)、朝阳沟 M3、叶茂台 M7(图五 5)、梯子庙 M3 等。

Ab 型 束口, 见于高成墓(图五, 2)、叶茂台 M22(图四 1)、七家墓、二林场墓(图四 2)等。

B 型 腹壁弧曲。见于叶茂台 M7(外腹剔刻莲花)(图五 6)、二林场墓(图四 3)。

花口碗, 分为两型。

A 型 口沿外展。见于叶茂台 M7(图五 7)、叶茂台 M14。

B 型 敞口, 可以分为两个亚型。

Ba 型 腹壁弧曲, 腹部较浅。见于陈国公主墓(图五 8)、耿延毅墓(图五 9)、浩特花 M1 等。

Bb 型 腹壁斜直, 腹部较深。见于高成村墓、清河门 M4(图四 4), 器内均刻划花纹。

盘 均花式口。可以分为三型。

A 型, 数量最多, 曲腹, 宽圈足。

见于关山 M7(图六 1)、后刘东屯 M2、叶茂台 M14 等。

B 型 斜直腹较深, 圈足较小, 仅见于高成村墓(图六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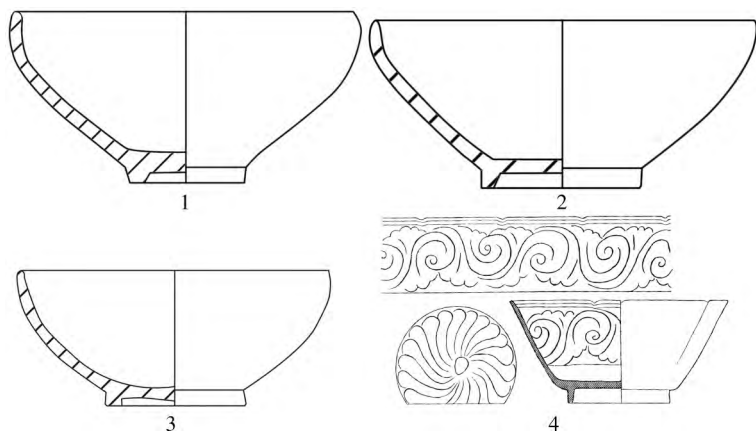
C 型 敞口、曲腹、卧足。仅见于东平村墓。

罐 仅见于叶茂台 M7(图七 1)及关山 M7(图七 2) 都有与之配套的斗笠形盖子, 大口, 矮直领, 球腹, 圈足外撇。腹部剔刻莲瓣及牡丹花纹。

以上器物之外, 还发现有穿带瓶、器盖、摩竭

表二 辽墓出土耀州青瓷注壶

单位	柄	装饰	盖子	流	尺寸(高)	图
床金沟 M5	麻花状曲柄上附圆环	颈部剔刻莲瓣; 腹部剔刻缠枝牡丹、莲瓣	柿蒂形浅盖, 盖顶有圆环	圆柱形曲流	23 厘米	图一 1
纺织厂墓	麻花状曲柄	腹部剔刻缠枝牡丹; 肩部剔刻莲瓣	圆钮帽形盖, 一侧有两个穿孔	蹲狮形流	24.5 厘米	图一 2
高成村墓	圆柱形曲柄	腹部剔刻缠枝牡丹	缺失	圆柱形曲流	20 厘米	图一 3
二道沟	圆柱形曲柄	腹部剔刻缠枝牡丹、莲瓣; 肩部阴线细划莲瓣	蒂钮多级帽形盖	圆柱形曲流	21.3 厘米	图一 4
叶茂台 M14	圆柱形曲柄	素面	宝珠钮帽形盖	圆柱形曲流	不详	



图四

1. 叶茂台 M22 碗 2. 通辽二林场碗 3. 通辽二林场碗 4. 清河门 M4 碗

形水盂、粉盒等(图八 图六 3)。

辽墓耀州青瓷与耀州窑址产品在造型、装饰上的相似。胎釉情况则较为复杂。胎色有深灰、浅灰或灰白。透明釉,玻璃质感强,釉面有开片。釉色有的淡青或天青,以至于被误判为景德镇青

白瓷;有的青绿;有的青中泛灰被称为蟹壳青。这些特征在耀州窑址五代宋初产品中都有呈现(图九)。辽墓出土耀州青瓷,内底均无支烧痕,应该为匣钵单件装烧。圈足外底内及足墙均有釉。足根部的釉,有的刮去,露出涩胎;有的没有刮去,遗有三处沙砾堆烧痕。可见采用了裹足垫烧的装烧方法。如此种种,正与五代宋初耀州窑址青瓷产品装烧特征相契合^[53]。

由于这些墓葬多数曾经盗掘,为探讨随葬耀州青瓷的组合造成了困难。

目前来看,组合最全的为叶茂台 M14(带盖注壶、盏托及盏、碗、盘),其次为高成村墓(注壶、碗、盘)、床金沟 M5(注壶、盏托)、二道沟(注壶、盏)、叶茂台 M22(盏托及盏、碗)。叶茂台 M7、关山 M7 则为罐及碗或盘的组合。类似的耀



图五

1. 耶律羽之墓碗 2. 彰武高成村墓碗 3. 陈国公主墓碗 4. 英凤沟 M7 碗 5. 叶茂台 M7 碗
6. 叶茂台 M7 碗 7. 叶茂台 M7 碗 8. 陈国公主墓碗 9. 耿延毅墓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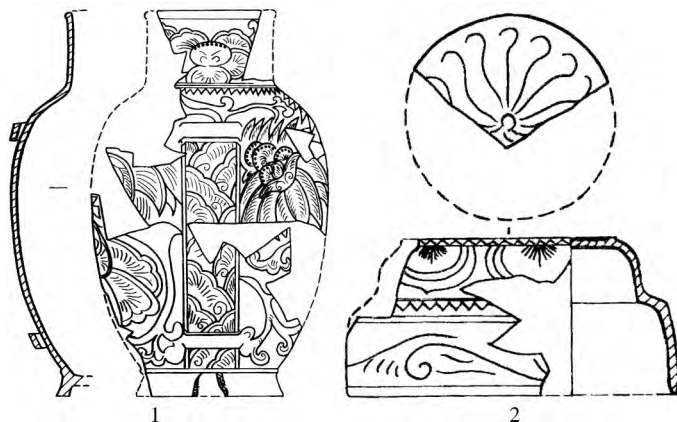
图六

1. 阜新关山 M7 盘 2. 彰武高成村墓盘 3. 水泉小水盂



图七

1. 叶茂台 M7 罐 2. 阜新关山 M7 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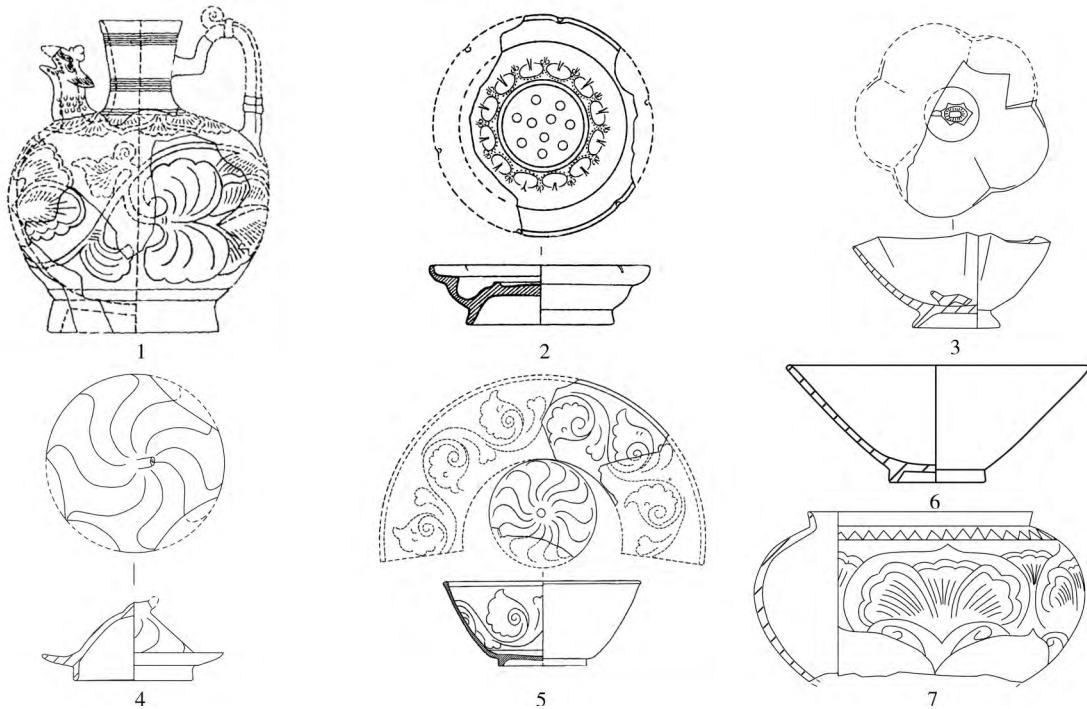
图八

1. 韩国嗣墓穿带瓶 2. 韩国嗣墓器盖

州青瓷酒具组合,亦见于河北平泉小吉沟辽墓^[54](注壶、盏托及盏、碗)以及陕西彬县后周冯晖墓^[55](958年,注壶盖、注碗、盏托及盏、碗、盘),也是同时期辽墓越窑青瓷及11世纪20年代之后辽墓青白瓷器的习见组合形式。

在《五代黄堡窑址》的报告中,与这些辽墓出土青瓷近乎相同的标本,均被定为五代时期的作品。即使考虑瓷器从出产、流通,到使用、随葬可能会有一个相对较长的周期,这个推论也未免绝对。不过,要想对这些辽墓出土耀州青瓷进行细致的编年与分期,目前条件似乎并不具备,只能笼统地说,这些青瓷的时代为10世纪中期前后到11世纪初,它们正好弥补了《宋代耀州窑址》报告中北宋早期(960~1022年)标本的缺环^[56]。

耀州青瓷集中出土在10世纪中叶前后到11世纪初的辽墓(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墓葬大多数为契丹贵族墓)中,之后就罕见其踪迹(直至辽朝灭亡),这个现象耐人寻味。10世纪中叶前后是契丹与中原五代(含北汉)政权直接联系至为密切的时期。入侵与劫掠几成常态,如《资治通鉴》卷二九二《后周纪三》记“契丹自晋、汉以来屡



图九 黄堡 - 耀州窑址出土青瓷

1. 91IVH8:7 2. 86IT14③:54 3. 88VT2③:19 4. 84IT11②:165 5. 86IVT6③:8 6. 86IVT6④:40 7. 86IVT6③: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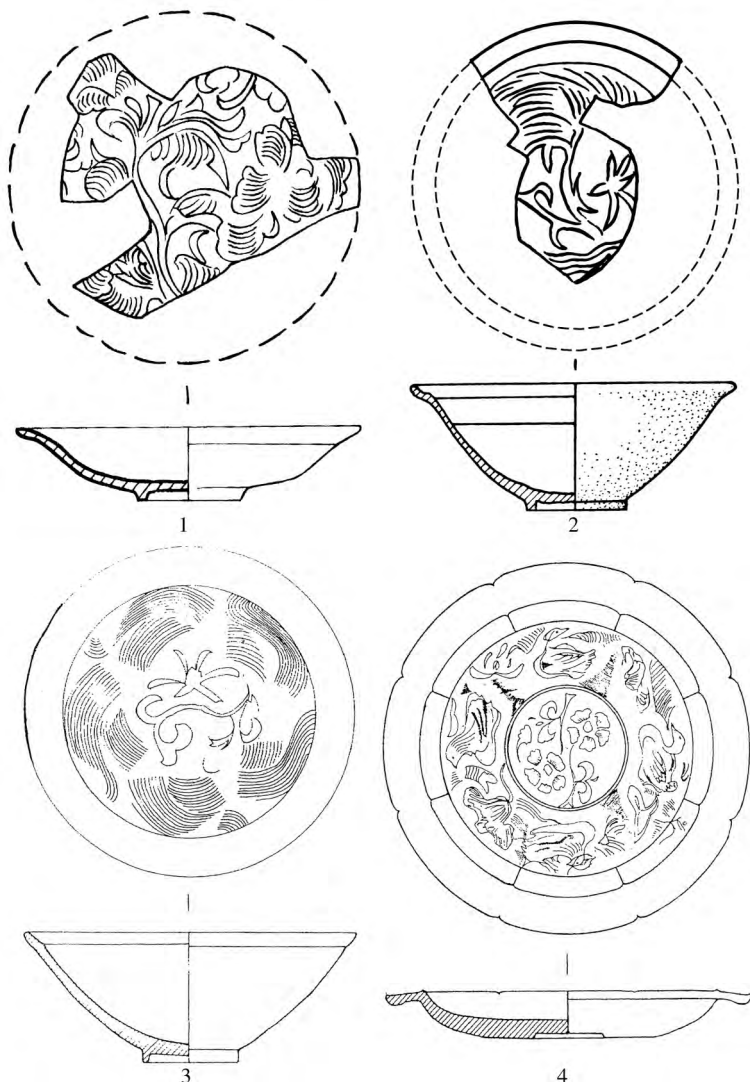


图一〇

1. 集宁路故城碗 2. 林西县温都窑藏炉 3. 和林格尔樊家窑乡碗 4. 绥滨中兴 M7 碗
5. 朝阳营州路遗址盘 6. 白城城四家子城址采集瓷片

寇河北，轻骑深入，无藩篱之限，郊野之民每困杀掠。”五代政权每每贡献奉进以满足契丹贵族对汉地奢侈物品的贪欲，如后晋“岁输（契丹）金帛

三十万之外，吉凶庆吊，岁时赠遗，玩好珍异，相继于道。”^[57]北汉“土瘠民贫，内供军国，外奉契丹，赋繁役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甚众。”^[58]



图一—

1. 清水河下城湾城址 T26③:3 2. 前郭塔虎城碗
3. 西丰凉泉窖藏碗 4. 西丰凉泉窖藏盘

在后晋进献契丹的物品中,就有内“画双鲤”的瓷器^[59]。后唐、后晋与契丹皆有贸易往来。《册府元龟》卷九九九记(后唐)明宗天成二年八月新州奏,得契丹书,乞置互市。^[60]《资治通鉴》卷二八三《后晋纪四》载“初,河阳牙将乔荣从赵延寿入契丹,契丹以为回图使,往来贩易于晋,置邸大梁。及契丹与晋有隙,景延广说帝囚荣于狱,悉取邸中之货。凡契丹之人贩易在晋境者,皆杀之,夺其货。”如上种种,都可推测为五代耀州青瓷流入辽境的途径。北宋建立后,契丹深入内地劫掠已不可能,彼此馈赠也仅限于皇帝及使节,榷场贸易应为瓷器流通的主要途径^[61]。《宋

会要辑稿》食货五二之三载“瓷器库在建隆坊,掌受明、越、饶州、定州、青州白瓷器及漆器以给用。太宗淳化元年(990年)七月,诏瓷器库纳诸州瓷器,拣出缺璽数目等第科罪……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九月,诏瓷器库除拣封榷供进外,余者令本库将样赴三司行人估价出卖。其漆器架阁收管器配供应,准备供进及榷场博易用。”在估价出卖的瓷器名单中,没有耀州产品。就考古发现而言,11世纪初之后的辽墓出土的输入瓷器中,定窑瓷器及景德镇青白瓷器成为主流^[62],耀州青瓷已很少发现了。

三

表一 31~42 诸单位,除黑龙江绥滨中兴两座金代墓葬外,余为城址和窖藏,出土耀州青瓷数量约在20件以上。这些耀州青瓷的类型,有三足香炉、碗、盘等(图一〇)。香炉的颈、肩及腹部,均有刻划或贴塑的花纹;碗、盘的内部,均有模印或剔刻的花纹(有的碗外壁也刻划花纹)。与辽代比较,东北、内蒙古耀州青瓷发现的数量显然少了很多。但是从流布的地域上,则比辽代有所扩大,在黑龙江东北部(甚至达俄罗斯滨海边疆区^[63])、吉林西部(前郭、洮南)、辽

宁东北部(西丰、抚顺)均有发现,这显然与金朝对这些地区的开发密切相关。金代耀州青瓷出土相对集中的地点,为内蒙古中南部的和林格尔、清水河以及察右前旗(图一一)。金代东北和内蒙古地区,与耀州已不存在政权的阻限;且耀州青瓷的使用,也从辽代以契丹贵族为主,变为一般民众的日用消费。内蒙古中南部发现较多,或许与其地近耀州窑场,且周围缺乏耀州窑竞争对手相关。至于东北、内蒙古东南部地区,赤峰缸瓦窑、辽阳江官屯窑等本地窑场在金代都进入盛烧期,产品数量激增;生产地点相对较近的定窑、磁州窑产品也大量涌入^[64],耀州青瓷难有竞争的优势,在该地

区发现较少也就容易理解了。

附记: 本稿写作得到王小蒙、宋玉彬、赵晓刚、张亚强、周兴启、徐戎戎、陈永婷、赵里萌等帮助, 谨致谢忱!

- [1]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陕西铜川耀州窑[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65.
- [2]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唐代黄堡窑址[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2.
- [3]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五代黄堡窑址[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7.
- [4]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宋代耀州窑址[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8.
- [5] 耀州窑博物馆.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铜川市考古研究所编. 立地坡、上店耀州窑址[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4.
- [6] 东北、内蒙古辽代遗存中耀州青瓷的辨识. 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发掘辽代陵墓、城址时, 往往将一类不同于越窑的青瓷称之为“北方青瓷”、“汝瓷”、“临汝青瓷”, 甚至将其中的部分标本臆测为“东窑”器。a. 小山富士夫. 支那青磁史稿[M]. 东京: 文中堂, 1943. 直到七十年代才从辽法库叶茂台 M7 遗物中首次甄别出耀州青瓷。b. 冯永谦. 叶茂台辽墓出土的陶瓷器[J]. 文物, 1975(12). 1997年《五代黄堡窑址》报告的刊布, 引发了以东北、内蒙古出土资料为主要依托的耀瓷分期、耀瓷流布等专题研究。c. 谢明良. 耀州窑遗址五代青瓷的年代问题——从所谓“柴窑”谈起. 故宫学术季刊[J]. 1998(2). d. 彭善国. 辽代陶瓷的三个问题[C]//吉林大学考古学系. 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学系成立二十周年纪念文集. 北京: 知识出版社, 1998: 384-396. e. 彭善国. 略论五代宋金耀瓷的流布[J]. 中原文物, 2000(1). f. 易立. 试论五代宋初耀州青瓷的类型与分期——以墓葬、塔基出土物为中心[J]. 考古与文物, 2009(2). g. 张红星. 内蒙古地区出土耀州窑瓷器[J]. 内蒙古文物考古, 2009(2).
- [7] 盖之庸. 探寻逝去的王朝——辽耶律羽之墓[M].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4: 92.
- [8]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白音罕山辽代韩氏家族墓地发掘报告[J]. 内蒙古文物考古, 2002(2). 其中青瓷器盖简报误作碗。
- [9]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哲里木盟博物馆. 辽陈国公主墓[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3.
- [10] 朝阳地区博物馆. 辽宁朝阳姑营子辽耿氏墓发掘报告[C]//考古学集刊(第3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 [11] a. 李文信. 关于辽萧德温墓的笔记和资料. 李文信考古文集(增订版)[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9: 632. b. 李文信. 辽瓷简述[J]. 文物参考资料, 1958(2).
- [12] a. 辽宁省博物馆. 辽宁铁岭地区文物组. 法库叶茂台辽墓纪略[J]. 文物, 1975(12). b. 冯永谦. 叶茂台辽墓出土的陶瓷器[J]. 文物, 1975(12).
- [13] 叶茂台 M14 的发掘报告. 迄今未见刊布, 只有零散的报道。a. 冯永谦. 辽宁地区三十年来辽代考古收获. 东北亚研究—东北考古研究(一)[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 111. b. 王秋华. 惊世叶茂台[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242. c.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沈阳考古发现六十年——出土文物卷[M].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08: 145.
- [14] 许志国. 魏春光. 法库叶茂台第22号辽墓清理简报[J]. 北方文物, 2000(1).
- [15] 林茂雨. 俭峻岩. 法库李贝堡辽墓[J]. 北方文物, 2001(3).
- [16] a. 张春宇等著. 彰武县文物志[M].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6: 91. b. 彰武县文物管理所. 彰武高成辽墓清理简报[C]//李品清编. 阜新辽金史研究(第五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c. 张柏主编. 中国出土瓷器全集(第2卷)[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51.
- [17] a. 李宇峰等. 彰武朝阳沟辽代墓地[C]//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辽宁考古文集.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3: 83-111. b.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文物精华[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2: 183.
- [18] 同[17].
- [19] 彰武县文物管理所. 辽宁彰武县东平村辽墓发掘简报[J]. 北方文物, 1999(1).
- [20] 阜新市博物馆筹备处. 辽宁阜新县契丹辽墓的清理[J]. 考古, 1995(11).
- [21]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关山辽墓[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1.
- [22] 梁振晶. 辽宁阜新梯子庙二、三号辽墓发掘简报[J]. 北方文物, 2004(1).
- [23] 李宇峰. 辽宁阜新县大固本辽墓发掘简报[J]. 博物馆研究, 1993(2).
- [24] 李文信. 义县清河门辽墓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 1954(8).
- [25] 该墓1968年8月发现于朝阳市旧城西北朝阳纺织厂, 由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清理, 墓葬详细报告至今未刊。a. 同[13]a: 107. 称“朝阳纺织厂统和二十六年(1008年)常遵化墓出土有青瓷雕花狮嘴注壶、围棋子等。”b. 刘桂馨. 辽代常遵化墓出土的围棋子[J]. 文物, 1997(11). 介绍常遵化墓位于朝阳纺织厂大门南约40米处, 1967年5月发掘。墓中随葬器物有白瓷大碗、盆、五曲花式口盘, 但没有提及墓内出土青瓷注壶。c. 朝阳市博物馆编. 龙城宝笈——朝阳博物馆馆藏文物精品[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1: 110. d. 及朝阳市文化局编. 朝阳馆藏文物精华[M].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9. 亦都未提及此注壶出土墓葬的墓主为常遵化。
- [26] 靳枫毅. 辽宁朝阳前窗户村辽墓[J]. 文物, 1980(12).
- [27] 铁岭市文物办公室等. 辽宁康平县后刘东屯2号辽墓[J]. 考古, 1988(9).
- [28] 辽宁省博物馆. 辽宁北票水泉一号辽墓发掘简报[J]. 文物, 1977(12).
- [29] 刘谦. 辽宁锦州市张扛村辽墓发掘报告[J]. 考古, 1984(11).
- [30] 朝阳市文化局编. 朝阳馆藏文物精华[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9: 178.
- [31] 同[30].

- [32]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巴林右旗床金沟5号辽墓发掘简报[J]. 文物, 2002(3).
- [3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扎鲁特旗浩特花辽代壁画墓[J]. 考古, 2003(1).
- [34] 潘行荣. 内蒙古科右前旗白辛屯古墓古城的调查[J]. 考古, 1965(7).
- [35] 张柏忠. 内蒙古通辽县二林场辽墓[J]. 文物, 1985(3).
- [36] 邵国田主编. 敖汉文物精华[M]. 赤峰: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4: 119.
- [37] a.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 黑龙江畔绥滨中兴古城和金代墓群[J]. 文物, 1977(4). b. 胡秀杰, 田华. 黑龙江省绥滨中兴墓群出土的文物[J]. 北方文物, 1991(4). c. 王辉等编著. 黑龙江考古文物图鉴[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彩页IX. d. 黑龙江省博物馆编. 黑龙江省博物馆馆藏精粹[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2: 27.
- [38] 同[37].
- [39] 张大为等. 西丰凉泉金代窖藏[J]. 辽海文物学刊, 1997(1).
- [40]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朝阳营州路出土瓷器[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 [41] 青山学院大学文学部史学科编. 三上次男藏品图版目录—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编[M]. 东京: 2013.
- [42]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0 年度发掘资料.
- [43] 2013 年城址调查采集资料, 赵里萌提供.
- [44] 王刚. 林西县发现金代瓷器窖藏[J]. 文物, 1996(8).
- [45]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清水河县下城湾古城发掘报告[C]//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万家寨水利枢纽工程考古报告集.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1.
- [46] 材料未刊, 参《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年报》2007 年.
- [47] 高延青主编. 内蒙古珍宝: 陶瓷卷[M].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7.
- [48]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陈永志主编. 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瓷器[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4.
- [49] a. 董新林. 辽代墓葬形制与分期略论[J]. 考古, 2004(8). b. 彭善国. 辽代陶瓷的考古学研究[M].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3.
- [50] 天津历史博物馆考古队, 蓟县文物保管所. 天津蓟县独乐寺塔[J]. 考古学报, 1989(1).
- [51] 张家口地区文化局. 河北张北县清理一座辽代壁画墓[J]. 考古, 1987(1).
- [52]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宋代耀州窑址[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8: 545.
- [53] 王小蒙. 五代黄堡窑青瓷与柴窑[J]. 收藏家, 2001(7).
- [54] 平泉县文保所, 承德地区文化局. 河北平泉小吉沟辽墓[J]. 文物, 1982(7).
- [55]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五代冯晖墓[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1.
- [56]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宋代耀州窑址[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8: 543. 报告作者认为北宋早期耀州青瓷产品类型很少, 与王朝初建, 经济上要求修养生息有关但政权的更迭并不一定导致窑场产量及产品类型及风格的剧变,《五代黄堡窑址》报告中应有不少耀州青瓷的时代为北宋早期.
- [57] 司马光. 资治通鉴[M]卷二八—后晋纪二.
- [58] 同[57]: 卷二九〇后周纪一.
- [59] 《挥尘录》(前录卷三): “韩似夫与先子言: 顷使金国, 见虜主所系玉带……虜主云: 此石晋少主(942~946年) 献耶律氏者, 唐世所宝日月带也. 又命取瓷盆一枚示似夫云: 此亦石主所献, 中有画双鲤存焉. 水满则跳跃如生, 覆之无它矣.” 见王明清. 挥尘录[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23.
- [60] 同卷又记: (清泰) 二年北面总管言契丹遣人欲为互市” “是年云州言总管报于州西北野固口与契丹互市从之.” (清泰二年) 十二月云州沙彦珣奏十年前与契丹互市则例.”
- [61] 陈述. 契丹社会经济史稿[M]. 上海: 三联书店, 1963: 113.
- [62] 彭善国. 辽代陶瓷的考古学研究[M].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3.
- [63] E. И. Гельман. ГЛАЗУРОВАННАЯ КЕРАМИКА И ФАРФОР СРЕДНЕВЕКОВЫ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ПРИМОРЬЯ [M],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99. pp119. E. И. Гельман, 金沢陽 訳, 沿海州における遺跡出土の中世施釉陶器と磁器[J]. 出光美術館館報, 1998(第105卷).
- [64] 彭善国. 试述东北地区出土的金代瓷器[J]. 北方文物, 2010(1).

(责任编辑 朱艳玲)